



李申 ◎ 著

任继愈 传

RENJIYU ZHUAN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李申
◎
著

任继愈 传

RENJIYU ZHUAN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任继愈传 / 李申著. —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
2016.9
ISBN 978-7-202-11352-3

I. ①任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任继愈 (1916—2009)
—传记 IV. ①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9244 号

书 名 任继愈传
著 者 李 申

责任编辑 李大星
美术编辑 于艳红
责任校对 付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4.375
字 数 299 000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 000
书 号 ISBN 978-7-202-11352-3/K · 1188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这是几年前应该做的事了。

任继愈先生去世以后，不少朋友都要我写一部先生的传记，向社会介绍先生的为人与为学。作为学生，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。然而我当时就未敢应承，以后也迟迟没有动笔。在我看来，先生的许多事，我都是当事人，所说只能看作自述，而难以作为传记。其次是虽然我追随先生整整三十年，却一直是埋头于自己那非常狭窄的领域，对于先生许多方面的工作和思想，并不了解。而我又缺乏采访、调查的能力，难以写出较为全面、准确反映先生工作和思想的传记。思想障碍难以消除，行动就迟迟疑疑。加之先生去世不久，心情难以平复，又有许多先生在世时嘱托的事要做，也就耽误了下来。

先生去世至今，五年多了。心情平静了不少，而先生所嘱之事，也还算正常进行。加之三十年来，一直在先生指导下工作，至少在某些方面，对先生的了解，比起别人，应该是深入一些。历史上的传记，也各种各样；作传者对于传主，其了解也都未必深入、全面。即使那些只能被视为自述的部分，也可给后人以参考。况且自己本来也

要写写追随先生三十年的那些事，姑且就称为“传”吧。好在传记不是决议、定论，后人还可再作。这样，我这难以称传之传，似乎也可作为一块石料，为后人更好的传记铺路。既念及此，也就不揣冒昧了。

李申，于2015年2月1日

目 录

第一章 家世与少年时代

- 一 先祖 / 1
- 二 大家庭与父亲 / 5
- 三 启蒙的小学 / 7
- 四 塑型的初中 / 14
- 五 手足情深 / 18
- 六 成长的高中 / 22
- 七 抗婚 / 26

第二章 大学生活

- 一 不安静的书桌 / 28
- 二 深挚而悲苦的文化使命感 / 31
- 三 湘黔滇旅行团 / 35
- 四 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 / 40
- 五 成人阶段的人格“修炼” / 43
- 六 艰苦的生活与真诚的友谊 / 47
- 七 艰难的时局和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/ 51

第三章 北大教师

- 一 黑暗岁月 / 59
- 二 反思“中华真精神” / 64
- 三 新政权和新思想 / 72
- 四 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/ 78
- 五 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（一） / 84
- 六 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（二） / 95
- 七 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接见 / 100
- 八 质疑日丹诺夫定义 / 107
- 九 《中国哲学史》与“四大块” / 117
- 十 创办世界宗教研究所 / 122

第四章 “文化大革命”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

- 一 批斗、抄家及国民党员风波 / 129
- 二 “五七干校”生活 / 135
- 三 眼睛失明 / 139
- 四 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 / 143
- 五 《中国哲学史简编》与儒法斗争 / 145
- 六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宗教研究 / 151

第五章 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在世界宗教研究所

- 一 宗教所恢复工作 / 160
- 二 培养研究生 / 163
- 三 创办宗教学专业和《宗教学讲义》 / 171
- 四 主编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 / 178

五	主编《中国佛教史》 / 188
六	主持编纂《中华大藏经》 / 194
七	主编《道藏提要》和《宗教词典》等 / 199
八	主编三部丛书 / 204
九	儒教问题与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反思（一） / 215
十	儒教问题与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反思（二） / 222
十一	关于办所方向的争论 / 226
十二	宗教研究方向的争论向社会蔓延 / 230
十三	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写作组的分化 / 237

目
录

第六章 国图的工作与最后的日子

一	到了国图 / 242
二	主编《中华大典》 / 251
三	《中华大藏经》下编 / 260
四	四译《老子》 / 266
五	研究《老子》的结论 / 274
六	古籍整理思想 / 279
七	古籍整理与“守土有责” / 285
八	特异功能与无神论学会重建 / 289
九	重建的无神论学会 / 299
十	创办《科学与无神论》杂志 / 305
十一	建议和进言 / 311
十二	创建无神论研究机构 / 315

第七章 先生的为人

一	志向引导人生 / 321
---	--------------

二	从士大夫的清高到共产党员的清廉 / 328
三	在家里也应该是共产党员 / 334
四	爱惜和培养人才 / 341
五	为人至诚 / 348
六	黑白分明 / 361
七	直道与恕道 / 369
八	规矩与风度 / 375
九	活泼爱美的天性 / 379

第八章 先生的为学

一	深挚而悲苦的文化情怀 / 384
二	四个坚持和一个不坚持 / 388
三	中国哲学的发展：三个阶段 / 395
四	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/ 402
五	文化传播的势差现象 / 409
六	继承优秀传统，批判封建主义 / 415
七	社会科学和群体智慧 / 422
八	脱贫与脱愚 / 427
九	教育问题——科举与蒸馒头 / 435
末 章	他也会倒下 / 443
后 记	/ 454

第一章 家世与少年时代

一 先祖

先生祖籍山东省平原县。往前追溯，则山东平原任氏源自山西，明初大移民到了山东。任氏一支最初建村，取名“任乡庄”，明朝中期，任氏出了个任士凭，遂改名“任庄”。因地处平原城城北，故又称“北任”。

任士凭，明朝嘉靖年间进士，历任顺天府尹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曾巡抚江西，最后死于刑部侍郎任上。按今天的官职，相当于副部长一级。不过现在的副部长多如牛毛，那时的侍郎屈指可数。

据现存史料，任士凭一生的政绩，主要有两件事。一是要求严厉惩处违法作恶的张真人，二是调查王守仁功过案，要求给王平反昭雪。

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家，远祖自称是张道陵。从宋代开始受皇帝加封，直到封为“天师”，是道教“正一派”的嫡系传人。明代开国，自称张道陵42代传人的张正常入

朝祝贺。朱元璋问：“上天还有老师吗？”于是改封张正常为“真人”，官阶等于二品。传至第二代张宇初，就曾因“坐不法夺印诰”（《明史·方伎·张正常传》）。又三传至张元吉，僭用乘舆，擅改文书，抢夺良家妇女，逼取他人财物。私设公堂，擅杀40余人，其中有一家3人都被杀害灭门的。当时刑部要求处死张元吉，后来张托关系得以赦免，然此后张氏传人并未收敛。

任士凭曾在礼部、吏部先后任职，“以清正称”。在顺天府尹位上，曾因张真人“俸赐太滥，怙宠毒民”（乾隆版《平原县志·乡贤》），要求对之削职治罪，但皇帝不予理睬。嘉靖帝死，穆宗继位，又有朝臣上书，要求治张真人之罪。此时任士凭出任兵部侍郎、巡抚江西。朝廷要求任发表意见，任士凭“力言宜革。乃去真人号，改授上清观提点”（《明史·方伎·张正常传》）。朝廷将张的官阶从二品降至五品。

在巡抚江西任上，任士凭又接到朝廷指示，要求调查“新建伯王守仁当宸濠倡乱之时，仗义勤王，奋身率众，中间分兵遣将，料敌设谋，斩获功次，擒缚渠魁等项，是否的有实迹可据？地方荡平后，其民情果否诵功？爵荫削除以来，群情果否称枉纵？果否准其子孙世袭？”任士凭经过认真调查之后，向朝廷报告说，宁王宸濠于当年六月十四日杀死朝廷官吏，公开反叛。当时王守仁正在外出视察途中，听到消息，立即“奋身率众”，调兵遣将，料敌设谋。不到一个半月，就平定叛乱。其人“学贯天人，才

兼文武；忠揭日月，功维社稷”，其人其功，可和开国勋臣刘基伯温比美。如能批准他家世袭爵位，是“扶植崇德报功之公道，兴起忠臣义士之世教”（王守仁《王文成全书》卷三八：任士凭《江西奏复封爵咨》）。

宸濠叛乱之初，王守仁一面传令各地集结兵力准备平叛，一面制造朝廷已知并令各地出兵平叛的假情报，迟滞叛军行动；同时向宸濠送密信，假意顺从，为集结兵力争取时间。这些措施，使宸濠观望了十几天，才悟到是王守仁的欺骗，于是决定出兵夺取南京。叛军夺取九江，逼近安庆。有人劝王守仁到安庆抵御，王守仁则直捣叛军老巢南昌。叛军如料回援，王以新集军力锐气，奋勇苦战，仅35天，就平定了叛乱。

然而此时的明武宗，认为当皇帝不如做大将军威风，御驾亲征。出京不久，听说王守仁平定了叛乱，心中遗憾，命令王守仁释放被擒的宸濠，然后由他再亲自抓获。一些朝廷官员因过去曾交通叛王，怕被王守仁揭露，又诬蔑王守仁原本服从叛军，只是看到朝廷出兵，才抓了宸濠，日后必反。这样，王守仁不仅未受封赏，反而要被治罪。明武宗很快驾崩，继位的嘉靖皇帝虽然给王守仁一个空爵，但没有实禄。此后的朝廷上，为王守仁事，不断进行争议。

四十多年以后，嘉靖去世，又有人要求复查王守仁一案，事情就落到了当时也和王守仁一样出任江西巡抚的任士凭身上。针对那些对王守仁的猜忌、诬蔑，任士凭理实

兼备、义正辞严地写道：

原任新建伯王守仁当宸濠叛逆之日，正督抚南赣之时。宸濠之未发也，若非剿平浰头等巢，则勇智绝伦之徒，皆为贼所用，必大肆蔓延之祸。及宸濠之既发也，若非行间以缓其出，则四方大兵之众，非朝夕可集，必难为扑灭之功。督伍文定，督戴德孺，督邢珣等，饱歌协力，足见分兵遣将之能；系省城，系黄家渡，系樵舍，决胜若神，信有料敌设谋之智。斩获功次，具载于纪功之册；而擒缚渠魁，甚明于交割之文。且奋身率众之劳，皆历历可据；仗义勤王之举，尚昭昭在人。先与后擒，乃濠党利己之诬，本不足辩。而其中原以北，终不能攻陷金陵以据者，要皆本爵至微之谋。论之今日，江西死节，皆蒙赠恤，生存皆获抚安，孰非本爵勤劳之举。地方荡平之后，诵功者载在口碑；爵荫削除以来，称枉者孚于士论。盖较之开国元勋，若非同事；而拟其奠安社稷，则与同功。

任士凭《江西奏复封爵咨》

吏部根据任士凭的这篇调查报告，经过合议，决定给王守仁恢复封爵，并得到皇帝的批准：“王守仁封爵，你每（们）既再议明白，准照旧世袭。”（《王文成全书》卷三八《再议世袭大典》）可以说，使明代王守仁一案得以圆满结束的过程中，任士凭的报告起了关键的作用。

五百年前的先祖对于先生，未必能有多少影响；先生

也未必关注五百年前先祖们的情况。然而读任士凭仅存的一篇文章，遥想其为人处世，与先生虽相距世代辽远，但他们实事求是、直道而行的为人风范，又如出一辙。故首先提及，算是先生传记的开场篇吧。

二 大家庭与父亲

先生出生时，任姓已是当地大族。全村除一户别姓，全都姓任。先生祖父辈，四兄弟没有分家，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大家庭。这个大族大家带给先生的，并不是荣耀和风光。先生曾经说过，在这样的大家庭里，财产是共有的，收入都要交公，然后统一分配，然而分配几乎没有公平的。因为分配原则不是按劳取酬，也不论人品好坏，倒常常是老实人吃亏。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实际却在勾心斗角。先生的父亲任箫亭，在这个大家庭里就是个受气的角色，于是离开这个家庭，投考了保定军校。他1914年入学，为二期步科生，晚于唐生智、李品仙（一期），早于张治中（三期）、傅作义（四期），同期有熊式辉、刘峙、陈铭枢等。

任箫亭1916年军校毕业，在山东新军任连长，1917年在山东省第六混成旅任营长。10年后，任陆军48师142旅团长。又10年后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任142旅旅长。1937年末，该旅参加了南京保卫战。次年，即1938年5月11日至14日，

该旅在安徽合肥东乡阻击战中与日军激战三天多，伤亡惨重。不久，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，部队伤亡殆尽。由于该部非蒋氏中央嫡系，不久即被取消番号。

1940年，任箫亭被委任了一个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的虚衔。1941年，大约因其为人正直，被委任为军法总监部西北办事处少将处长。当时西北军政长官是胡宗南，其部下违犯军纪，常常被蒋介石写条子保释。任箫亭无法履行职责，遂于1943年辞去军职，租种了西安东关道教八仙庵的土地，种果树，养奶羊，出卖水果、羊奶，维持生计，偶尔也卖点字画，贴补家用。依照相关的政策，经济地位改变三年以后，就可以改变阶级成分。1949年全国解放时，任箫亭做佃农已有六七年，被定为城市贫民。1952年，他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简称“民革”。从1962年到1976年去世，担任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委员。

先生曾谈及他的父亲说，当兵的都爱枪，特别爱好枪。但是他父亲得到了好枪，都先发给直接参与作战的基层部队。他自己，包括他身边的警卫人员，都没有什么好枪。警卫人员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好枪？他说，等到你们需要用枪的时候，就糟糕了。

一个对部下宽厚的军人，很难会逢迎、巴结上司，这当是他升迁很慢的原因。而他后来终于辞职，也充分说明他勤于谋事而拙于谋身的品格。

先生也曾谈及他父亲辞职后的生活，说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，天天背着一个帆布褡裢，挨家挨户送羊

奶，这是一个有所不为的狷者的形象。

“有所不为”一词出于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子曰：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“中行”，即“中道”，就是行为合乎道，这是行为的最高标准。如果遇不到，那么，还有两种人，也是可以做朋友的。一是“狂者”，其特点是“进取”；二是“狷者”，“有所不为”，即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。人生在世，个人的力量很小。许多情况下，大势所趋，个人很难左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至少要保持一个原则，就是要有一条做人的底线，不能越过。先生的父亲作为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将军，旧部老友，总会有一些，只要稍微肯妥协，总会有一碗轻松饭吃，而不至于天天背着褡裢挨家挨户地送羊奶，但是他没有。

从古到今，在所谓高人隐士的队伍中，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，到“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”的朱自清，和这些人相比，任箫亭的事迹可能算不得什么。但那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的、不向恶势力妥协、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，却是一样的。

三 启蒙的小学

先生出生于1916年4月15日。母亲宋国芳不识字，经过自学，达到可以写信的程度。当年父亲已在山东新军中任

连长，经济生活还算宽裕。但母亲吃苦耐劳，持家勤俭。先生一岁时出天花，医生给开了汤药。小孩不愿喝药，把药碗蹬翻了。母亲跪趴在地上吮吸残剩的药汤，再通过喂奶把药性传给孩子。先生晚年讲起这些往事，还常常热泪盈眶。

先生三岁时得了白喉，八岁时又得了猩红热。和天花一样，对于儿童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都是九死一生的病。先生晚年谈起他童年的这些经历，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不易，重病不死，也是一种机遇巧合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家庭经济条件尚可，治疗及时的缘故。这也是先生生在军官家庭的幸运，是中国文化的幸运。

童年时，父亲为他请了家庭教师，所以不必进私塾。从认字到上正规小学，由于军队常常调防，先生的读书也换过许多地方，直到九岁，1925年，最后一次上小学，才被送入山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所小学先是改称大明湖小学，后来又改称实验小学，原址是济南府学孔庙所在地。辛亥革命后，中华民国不祭天，也不祭孔，许多孔庙改作新式学校，山东省立模范小学也是这种情况。

济南市离平原县较远，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利，所以先生就借住在亲戚家里。吃住都很好，就是离乡背井，缺少朋友，感到孤独。孤独中的伙伴，主要是书。这倒培养了先生喜欢读书、也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。比如他有时候看到蚂蚁在砖头上爬，砖头倒过来，蚂蚁也不掉下